

# “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

## ——明中期至清中期海防论著的初步考察

李 恭忠

**摘要：**明代的“倭患”经历，留下了持续的“倭寇”记忆，并对明清时期的海权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中期以迄清中期的海防论述，多以“倭/寇”为假想敌，以“备倭/防寇”为基本着眼点，从明嘉靖年间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到鸦片战争前夕严如煜的《洋防辑要》，莫不如此。这些海防论著表达了一种“眼光向后”的海权观念。从时间意义上看，这种海权观念多以数百年前的历史经验为准绳，而不是密切关注变化中的现实形势；从空间意义上看，这种海权观念多以陆权为中心，目标在于如何“防”海，而非如何经略海洋。结果，15-18世纪，中国政权的海上关注焦点一直放在东亚秩序圈内的传统挑战者（“倭/寇”）身上，却忽略了正在膨胀的另一种新兴挑战者——欧洲商业殖民主义。对手意识的错位，已经埋下了中国在中西海权竞争中失败的深刻缘由。

**关键词：**倭寇 历史记忆 海权

### 前言

明代的倭寇问题久为史学界关注。已有的论著中，探讨倭患经过、原因和性质，以及平倭人物、策略和经过者占绝大多数。相比之下，关于倭寇对明清时期社会、文化、思想的深远影响，却较少为人关注。直至近年来，随着一些新的论著的出现，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sup>1</sup>。本文尝试探讨另一个问题，即“倭寇”记忆如何影响了明清时期中国海防思想，乃至海权观念的变迁。明朝嘉靖末年以后，以郑若曾编撰《筹海图编》<sup>2</sup>为代表，曾经身历倭患的一些人，以及关心海洋事务的士大夫，相继编纂了一系列筹海、海防论著。这些论著寄托着一代人对倭寇事件的记忆，也表达了他们对海洋事务的见解。并且，在随后的两百多年里，他们的作品，连同作品中包含的倭寇记忆与海事见解，一直为后人所传承下去，从而在16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前期形成一种持续的“涉海”话语，对这一时期中国的海洋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sup>1</sup> 相关文章主要有：郑樑生：《明东南沿海地区倭乱对明朝财赋的影响》、《明嘉靖间之倭乱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残破》，收入《中日关系史研究论文集（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郑樑生：《明代倭乱对江南地区人口所造成的影响（1553-1556）》，“家庭、社会、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苏州：1998年；冯贤亮：《城市重建及其防护体系的构成—16世纪倭乱在江南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王铁钧：《明代的倭患与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华侨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许金顶：《倭寇之患与福建民俗》，《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

<sup>2</sup> 关于《筹海图编》的作者，广为流传的天启本、四库本、四库提要皆作胡宗宪著。经学者们考证，该书作者确为郑若曾。对于《筹海图编》，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考证其版本、作者情况，或者把它当作“倭患”史实的一手记载来运用，或者侧重于发掘其军事谋略价值。参见范中义：《筹海图编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汪向荣：《关于筹海图编》，载氏著《古代中日关系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一般以为,在马汉关于海权的经典论述引入之前,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海权思想。就近代意义上的“海权”定义而论,这种看法固然不无道理。不过,若从对“海利”、海防的认识而言,近世中国海商的海上活动盛况,明初郑和下西洋这一壮举所反映的国家海上力量的强大,明清时期的诸多筹海、海防论著,以及这一时期中国的海洋政策和海防制度,均传达了一种持续存在的海洋实践和海权观念<sup>3</sup>。当然,这种海洋实践与海权观念,与近代欧洲的情况差异很大。具体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复杂原因,尚待进一步考察。本文仅从倭寇记忆与明清时期海防论著的变迁这个侧面进行初步探讨,希望能够引发更深入的批评和研讨。

## 一、“倭寇”记忆与明代海防论的产生

史学界基本公认,明代的倭患大致经历了一个积渐而至的过程,自明初开始,东南沿海地区即屡有零星的倭寇事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由于政策失当,遂演变为嘉靖年间大规模的“倭患”<sup>4</sup>。对于这一历史过程,明中后期的各种官私著述、地方史志均有详略不同的叙述,从而构筑了不同层次的“倭寇”记忆。官方著述以《明实录》为代表,逐年记述嘉靖倭患的平定经过。私人著述方面,明万历年间以后,出现了一批记载倭患经过、探悉倭患缘由的著作。万历年间张鼐的《吴淞甲乙倭变志》二卷,分纪兵、纪捷、歼渠、周防、十德、十勋、十忠、十节、僧兵、狼兵、盐丁、遣祀、三太学、四辩士、两孝子、三乞儿、三腐儒等十三目,详细记述嘉靖年间吴淞倭患情况。黄俟卿的《倭患考原》二卷,记述洪武初年至万历中期中日关系简史,探究嘉靖、隆庆年间福建倭患的缘由。它如徐学聚的《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以编年方式记述嘉靖三十一年四月至四十三年三月东南浙闽一带倭患情况;《倭寇事略》,主要记述浙江海盐地区的倭患情况;《金山倭变小志》,主要记述江南金山一带倭患情况。至于倭患波及各地,嘉靖以后修纂的地方史志,无不对当年的倭患念念不忘。

明代倭患在给后人留下深刻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对明中期以后的海防思想产生了持续影响。这一点,可从初刊于明末天启元年(1621年)、作为兵书集成的《武备志》中一席话得到反映。《武备志》的“海防”部分,开篇即为编者茅元仪的感叹:

茅子曰:海防岂易言哉!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海之严于防,自肃庙时始也。汉之于海外也,我逞其武,彼敢内窥?若晋唐以降,番舶以通其利,朝贡以靡其犷,时有寇掠,未为深虞。日本在宋以前,与诸国不相高下,自元初败范文虎之师,始狡然有启疆之虑。以二祖之威德,柔而致之,时肆其毒,故予沿海兢兢焉,然以辽东受衄,不致大衅。嘉靖之际,经措失方,以天下钱谷之本,供其渔猎,国几不支,苟非纠纠虎臣,批根荡窟,则中原九塞,乘间而发,岂能有百岁之安哉!而其要在拒之于海,故首采诸家之论,因按胡宗宪、郑若曾绘分合诸图,而并按其戍守险要、兵力,以永示来者焉。<sup>5</sup>

<sup>3</sup> 近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从航海史、海外贸易史、中外关系史、海军史、港口史等方面着手,对古代中国的海洋实践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不赘述。不过,从海权角度着眼研究还比较少,已有的探讨主要集中于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意义及其性质,参见时平的《元明时期的海权观念与郑和下西洋》(1988)、《古代中国海权观的发展》(1993)、《论郑和海权的性质》(1995)等论文,收入杨新华、时平著《中华海权与历史文化》,北京:海潮出版社,1997年,第48-61、35-47、62-69页。

<sup>4</sup> 参见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sup>5</sup> 《武备志》,卷209,《续修四库全书》(965)·子部·兵家类,第744页。本文引文中的所有着重号、下划线,均为引者所加,下同。

上述文字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日本对中国形成了根本威胁，中国海防之兴，正是起因于日本的入犯；海防学问的源头即在于当年的御倭历史，后人应该认真继承前人的御倭经验。茅元仪编辑《武备志》的时代，距离风起云涌的嘉靖倭患已经半个多世纪，但很显然，他的头脑中依然存留着深刻的倭寇记忆，这种记忆并且影响了他对海防问题的思考。

茅元仪所辑录的胡宗宪、郑若曾绘分合诸图、诸家之论，即世传为胡宗宪所著、实为郑若曾所纂的《筹海图编》。该书可谓明中期以后因倭患而催生的海防论著的滥觞，对此后两百余年的同类论著有着持续的影响。

郑若曾（1503—1570），字伯鲁，号开阳，南直隶昆山人，嘉靖年间入总督胡宗宪幕府，参与平倭事务。受胡宗宪委托，他编撰了《筹海图编》十三卷。该书可以说是明代倭患经历催生的产物。关于该书的编辑初衷，郑若曾在“刻筹海图编引”中说得很清楚：“壬子以来，倭之变极矣……当变之始作也，莅事者欲按往绩，便地利，使×技，以图万全之功，而记载蔑如，无所从得，仅有《日本考略》，挂纤漏巨，无关成败，咸以为恨。荆川唐公顺之谓曾：‘宜有所述，毋复令后人之恨今也’”<sup>6</sup>。也就是说，明初以来愈演愈烈的“倭患”经历，以及相关研究的缺乏，在郑若曾这一代亲历者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进而促使他们去研究倭情、整理御倭经验，创作出划时代的海防著作，以为后人之借鉴。

《筹海图编》一书以“倭寇”为关注焦点，重在全面总结倭患和御倭历史，分析经验教训，探求备倭方略。全书的内容安排即体现了这一点。卷一所载72幅广东、福建、浙江、直隶、山东、辽阳“沿海山沙图”和“日本岛夷入寇之图”，参考了前人已有的各种沿海图，特别是6幅身预倭事的文武官员所作的浙江沿海图籍，“综合明中期因抗倭而聚积的海防资料成果”<sup>7</sup>，用不同图形和符号标注沿海各军事、行政单位名称（如府、州、县、巡检司、卫、所、镇、营、堡、关隘、烽燧、水寨等），以及山丘、港湾、河口、岛屿、沙洲、礁石等情况，形成了最翔实的海防图，对于掌握海防地理形势极为重要。卷二包括“王官使倭略”、“倭国入贡事略”，系对中日关系史的简要梳理；以及“倭国事略”和两幅“日本国图”，系对日本国情的全面研究，涉及地理、区划、人口、词汇、造船方式、货物需求、搏击攻掠战阵之术、兵器等方面。卷三至卷七，分述广东、福建、浙江、直隶、山东和辽阳五片海疆形势。每卷首为沿海各府地图；次为“兵防考”，开列沿海各地自提督、总督、各级镇将以次沿海卫所、巡检司烽墩的分布及员额，以及沿海卫所战船数量；再次为“倭变记”，编年概述该省区自民初以来历年倭患情况；最后为各省事宜，综述该省区海防地理形胜和备倭要点，这些形胜要点适与卷一的“沿海山沙图”相配。卷八至卷十，集中记述嘉靖倭患的情况，首以图表逐月列述惠潮、漳泉、兴福、温台、宁绍、杭嘉、苏松、常镇、淮扬八个区域的倭患大事，次以谱系图简要显示十四股“昭灼人之耳目”的倭寇概况，次记平倭过程中取得的历次“大捷”，次录历年倭患中的殉难者名字、身份。最后三卷“经略考”，既有宏观层次的政略、战略思考，也有微观层次的战术、纪律、兵船、兵器等内容；既包括军事方面的战守、训练、城建、保甲等内容，也包括经济、外交方面的内容。总的来看，该书图文并茂，可谓明代前中期备倭、御倭方略的全面总结。《四库全书》关于该书的提要，称其“于明代海防亦云详备。”

除了《筹海图编》，郑若曾还有《江南经略》、《郑开阳杂著》两书。《江南经略》全书凡八卷，每卷又分二子卷。卷一之上为兵务总要，卷一之下为江南内外形势总考。卷二之上至

<sup>6</sup> 《筹海重编》，卷之首，“刻筹海图编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7册》，第6页。

<sup>7</sup> 张伟国：《明清时期长卷式沿海地图述论》，载李金强、刘义章、麦幼生编：《近代中国海防—军事与经济》，香港：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1999年，第3—16页。

卷六之下，分苏州、常州、松江、镇江四府所属山川险易、城池兵马，各附以土寇要害。卷七上下论战守事宜，卷八上下则集论战具战备，而终以水利积储与苏松之浮粮。四库提要称该书“为江南倭患而作，兼及防御土寇之事……明季武备废弛，法令如戏，倭寇恒以数十人，横行数千里，莫敢撓锋，土寇亦乘之不靖。若曾此书，盖专为当时而言，故多一时权宜之计。福建林润时为应天巡抚，为评而刊之，所评亦多迁就时势之言。然所列江海之险要，道路之冲僻，守御之缓急，则地形水势今古略同，未尝不足以资后来之考证，究非纸上空谈，检谱而角抵者也”<sup>8</sup>。《郑开阳杂著》则是郑氏旧作的汇集，凡十一卷，包括“万里海防图论”二卷，“江防图说”、“海防一览”、“海运图说”、“黄河图议”各一卷，“日本图纂”、“朝鲜图说”、“安南图说”、“琉球图说”各一卷，以及“苏松浮粮议”一卷。其中“万里海防图论”的文字部分和“日本图纂”，即为《筹海图编》相关内容的原型。四库提要称该书“江防、海防形势皆所目击，曰本诸考皆谘访考究得其实据，非剽掇史传以成书，与书生纸上之谈固有殊焉”<sup>9</sup>。

当代学者指出：“郑若曾的著作标志着中国地理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明代以前，中国的边患主要来自北方，边疆地理学者多垂注北方，对其它部分则甚少留意。《筹海图编》及《江南经略》把国人的注意力部分地移往东南沿海地区”<sup>10</sup>。《筹海图编》初刊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隆庆六年（1572年）、万历年间（胡灯重校本）、天启四年（1624年）、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分别有重刊本。《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边防之属，只收录了两部著作，即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和《郑开阳杂著》。《江南经略》则被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筹海图编》中的海防图籍，也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万历年间以后出现了更多的海防地图，比如《乾坤一统海防图》、《全前海图》、《全浙海图》、《广东沿海图》、《福建海防图》、《全海图注》等，它们“多以郑氏沿海山沙图的图式为蓝本”<sup>11</sup>，形式均为长卷式地图，内容均为沿海各地海防备倭资料的汇集。郑氏著作在明清海防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在郑若曾之后，明中后期出现了更多的海防论著。万历二十年，日本进犯朝鲜，再度激发海疆之警。总督两广军务萧彦认为《筹海图编》“谈海事甚具”，遂命邓钟删其繁芜，添以续闻，重辑成书，命名为《筹海重编》。萧彦推许是书“可与九边图论并存”，一者“以防虏”，一者“以防倭”<sup>12</sup>。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浙江温处兵备兼巡浙东道副使蔡逢时，有感于“浙为海内首藩，而浙之东南温处，其门户也”<sup>13</sup>，嘉靖年间倭患尤深，而《筹海图编》、《海防类考》等前人论著于浙东海防论述仍不够详细，乃据当时文书册籍，编成《温处海防图略》二卷。该书于浙东水陆冲要、风潮汛期、入寇海道、驻防兵制、兵饷船械，以及城防战守选练之法，均详细记载，并附有“温处地图”、“温区海图”、“倭夷入寇海道图”、“日本倭岛图”。

万历三十年，鉴于“浙省东南一大都会，郡邑半临海滨，每年汛期，防倭为急”<sup>14</sup>，并且

<sup>8</sup> 《江南经略》，提要，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9</sup> 《郑开阳杂著》，提要，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10</sup> 罗天佑、方骏：《郑若曾的海防思想》，载李金强、刘义章、麦劲生编：《近代中国海防—军事与经济》，香港：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1999年，第17-40页。

<sup>11</sup> 张卫国：《明清时期长卷式沿海地图述论》。

<sup>12</sup> 《筹海重编》，萧彦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7册》，第2页。

<sup>13</sup> 《温处海防图略》，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6册》，第642页。

<sup>14</sup> 《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册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6册》，第275页。

浙省沿海在嘉靖倭患中被害颇深，时任浙江按察使司管海兵道事的范涑，奉钦差提督军务、巡抚浙江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刘某之命，在参考《筹海图编》和万历三年刊印的《海防类考》等书的基础上，综合万历以来浙江海防的新资料，纂成《两浙海防类考续编》一书。该书凡十卷，内容结构仿《筹海图编》，尤详于浙江沿海兵卫巡防饷额事宜。是书编成后，浙江巡抚令各沿海兵道、府衙有司，及参将、游击、各倭把总衙门，自备纸张到省城各抄写一份，带回各地遵守施行<sup>15</sup>。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曾任浙江按察使、时任湖广学政的王在晋编成《海防纂要》。是书的编纂缘由，王在晋的自序中说得很明白，乃是由于倭患日紧：“昔所虞者，零星剽掠之倭；而今所虞者，大举入寇之倭。昔之倭为边幅四肢之患，今之倭为神京肘腋之患。山城五岛之间，隐然树一敌国。我虽厉兵磨刃，终不能侵倭之尺寸；而彼之凭陵吞吐，常窥我之寻丈。当事者不得不以倭为外惧”<sup>16</sup>。他认为“今所为防倭要书者，曰筹海图编，再辑为筹海重编，迺又纂为海防类考，谟略具载，而近事或有所遗轶”<sup>17</sup>，于是参照《筹海图编》、《筹海重编》、《海防类考》三书，结合新近的资料，编为《海防纂要》一书。该书亦分十三卷，“与筹海图编同”，内容包括山海舆图、沿海事宜、外国考暨程途针路、朝贡通考、船器攻围法、经略事宜、大捷考、获夷纪略、行军法令、功令、祭祷、医药、选日、占验等14个方面，其中祭祷、医药、选日、占验等为王在晋新增内容。关于最重要的“经略事宜”，《筹海图编》开列了36条<sup>18</sup>，《海防纂要》保留了其中30条<sup>19</sup>，另增补了26条<sup>20</sup>，合为56条。王在晋自认为，“是编合三书而寓目焉，海防要目，庶可穷其梗概也”<sup>21</sup>。

直至天启元年，茅元仪刊行《武备志》，其中“海防”部分亦取自郑若曾的著作。是书“海防”部分首卷收录了五篇“诸家论记”，其中第一篇“御海洋论”、第三篇“固海岸论”、第四篇“勤会哨论”，均辑自《筹海图编》第12卷。第二篇“洋山记”，则完全引述郑若曾论述浙直海防地理形势的文字：“郑若曾曰：洋山乃苏松御倭海道之上游也……洋山南去定海，北去吴淞，皆一潮，盖在浙直之交，适中之地也。曾尝出定海关，浮海舟刃踏堪海防形胜，而深有感于天心设险，以限华夷。……陈钱者中国海山之尽处也，倭楫击空明而来，万里风涛，茫无际涯，望见陈钱，则喜中国将近，有山可泊。既至陈钱，然后南北分舟宗，若经马迹、大衢而西，过舟山，则两浙受其患；不经大衢、舟山，而向洋山之西，迤北而行，则…苏松、江北惟其所聘矣”<sup>22</sup>。“御海洋论”记载了胡宗宪、郑若曾的防海观点：“胡宗宪曰：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犹江防者必防之于江，此定论也……郑若曾曰：

<sup>15</sup> 《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册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6册》，第276页。

<sup>16</sup> 《海防纂要》，序二，《续修四库全书（739）·史部·地理类》，第638页。

<sup>17</sup> 《海防纂要》，序二，《续修四库全书（739）·史部·地理类》，第638-639页。

<sup>18</sup> 即“叙寇原、除内逆、定庙谟、择将才、实军伍、选士卒、恤军属、精教练、足兵饷、清屯种、汰冗食、慎募调、集众谋、收图籍、定武略、鼓军气、公赏罚、禁妄杀、处首级、恤伤残、御海洋、固海岸、勤会哨、谨瞭探、重邻援、散贼党、慎招抚、择守令、拯民穷、严城守、筑城堡、广团结、行保甲、降宣谕、通贡道、开互市”。

<sup>19</sup> 即“定庙谟、叙寇原、除内逆、择将才、实军伍、恤军属、精教练、足兵饷、清屯种、汰冗食、集众谋、收图籍、公赏罚、禁妄杀、御海洋、固海岸、慎招抚、散贼党、择守令、筑城堡、通贡道、开互市、定武略、鼓军气、处首级、恤伤残、广团结、降宣谕、重邻援、行保甲”。

<sup>20</sup> 即“谨瞭探、周间谍、备水陆、练气力、习锐炮、调客兵、诘奸细、别号色、宽剿除、恤阵亡、广招赏、先整备、倡勇敢、议征集、辨真伪、抚归降、慎征讨、严哨探、设城铺、谨更寐、密搜罗、期共济、严伏路、审寇术、辨船器、禁通番”。

<sup>21</sup> 《海防纂要》，凡例，《续修四库全书（739）·史部·地理类》，第642页。

<sup>22</sup> 《武备志》，卷209，《续修四库全书（965）·子部·兵家类》，第747页。

……自御海洋之法立，而倭至必预知，为备亦甚易，非若乙卯以前，倭舶至岸，人犹未觉其为寇也……哨贼于远洋而不常厥居，掣贼于近洋而勿使近岸，是之谓善。”茅元仪对此颇表赞同，引述完上述观点后，作出了简短的结论：“体二公立法之意，而悠久可行矣”<sup>23</sup>。《武备志》“海防”部分还收录了如下舆图：“舆地总图”，“日本入犯图”，广东、福建、浙江、南直隶、山东、辽东“沿海山沙图”，“广东沿海总图”，广东廉州、雷州、高州、广州、惠州、潮州各府图，以及“江防图”、“湖防图”，这些地图均为郑氏著作中所收地图的翻版。

通观上述海防论著，有两点颇值得注意。

首先，这些著作尽管产生的时间并不一致，前后相差半个多世纪，且具体时局背景亦不全相同，但它们在关注焦点和具体内容上都有着明显的延续性和相似性。与郑若曾的著作一样，它们都承载着深厚的“倭寇”记忆，都以“御倭”为基本着眼点，形成了一种持续存在的以“倭/寇”为假想敌、以“防海”为宗旨的“备倭”话语。这种话语的基本结构包括如下方面：倭寇的特性、危害，倭寇常至路线、地点，沿海防倭要冲，御倭方略。可以说，后来诸书基本都奉郑若曾的《筹海图编》为圭臬，都在不断更新郑若曾的著作。这有点类似于今日的 Windows 操作系统，不断有更新版本推出，然而不同版本的基本精神和结构却基本相似，具体内容亦多有雷同。由此可见，郑若曾那一代人的“倭患”记忆，以及由此催生的“御倭”经验，已经为后人所延续下去，并型塑着后人对海防事务的认知。

其次，上述涉海论著的书名（或者标题），有一个前后变化过程。早期的作品，比如郑若曾的两部经典著作，分别以“筹海”、“经略”为题；而后来的同类作品，则多以“海防”为题。动词是人的主观意念、心态的直接表达。“筹”与“防”虽仅一字之差，但结合王在晋前述自序，却隐约可见晚明士大夫在海权观念方面的微妙走向，即在海疆危机面前越来越感到被动、无奈，越来越倾向于内守式的防卫。

## 二、清前期海防论中“备倭”话语的延续

明中后期形成的“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并未因明清易代而中断。从清初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尽管时间逐渐推移，但它依然顽强地存留在各种海防论著之中。

清代的的海防论著，首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与郑若曾一样，顾炎武亦为昆山人，留心经世之学。该书从各种文献中摘录资料，按照明代两京十三布政司的区域划分，细致论述各地建置、赋役、屯田、水利、军事、关隘、边防、海防情况。关于苏州、苏松、浙江、福建、广东的各卷，辑录了丰富的明代海防资料，其中多有对郑若曾等明人著作的继承。比如关于苏松海防，明确引用郑若曾《筹海图编》中的话：“海防之策有二：曰御海洋，曰固海岸。何谓御海洋？会哨陈钱，分哨马迹、大衢、羊山，遏贼要冲是也。何谓固海岸？修复备倭旧制，循塘拒守，不容登泊是也……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断乎以御寇羊山为上策。”引用完之后，顾炎武并且评论说：“其言是也，盖苏松事体与福浙不侔，夫倭船之来，必由下八山分觐……”<sup>24</sup>。关于苏州腹内太湖地区的防备，顾炎武详细引用郑若曾“今日倭患志在掳掠，而村镇已尽，则必趋于未经兵火之地”等语，然后添加如下注释：“向来论经略者，多未之及。或谓东西湖庭及滨湖诸山，古来兵火不及，何必议守。然自古大兵之下江南也，或从京口，或从三坝，志在城郭，则山林必在所弃。若倭夷土寇则不然，志在掳掠，弃无就有，今腹内诸村镇搜刮已尽，必趋于未经兵火之地，则沿湖诸境，非所当

<sup>23</sup> 《武备志》，卷 209，《续修四库全书》（965）·子部·兵家类，第 745、746—747 页。

<sup>24</sup> 《天下郡国利病书》，《续修四库全书》（595）·史部·地理类，第 757 页。

防者耶！”<sup>25</sup>是书收录的海防图，亦仿郑若曾《万里海防图》初稿的样式，海在上，陆在下，描绘山脉、合流、港汊、湖泊、海岛、烽堠、城池、行政和军事机构的概貌，并于要害处以方框文字说明之。比如浙东海防图部分方框文字：“临山卫系要冲，嘉靖三十二年倭贼攻陷，今留前、中二营各二哨官兵防守，分哨泗门等处”；“宋家浅地方要冲，嘉靖三十五年倭贼登犯，曾设兵船于蛭浦港防守，因水浅沙硬，议将前船改泊烈港哨守”；“三江所冲要，嘉靖三十五年倭寇突犯攻城，敌退，春汛派拨绍兴左营官兵二哨防守，分哨宋家浅等处”；“西汇嘴边海险要，嘉靖三十二年倭贼登犯，春汛派拨绍兴左营、临山中营各一哨官兵防守……分哨蛭浦等处”；“龛山、鳖子门冲要，嘉靖三十二年倭贼登犯，先后建寨，拨兵防守”。<sup>26</sup>这些文字，与深受郑若曾著作影响的《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一海图相关部分的方框文字一模一样，前后继承关系非常明显。由于该书在清代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它实际上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明中期以来的“倭寇”记忆和“御倭”经验，由此得以保存，并继续传承给后人。

大致与《天下郡国利病书》同一时期，还有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顾祖禹与顾炎武同为清初著名的经世学者，他这部书可以说是一部军事地理著作。全书共一百三十卷。首为历代州域形势九卷，记述历代王朝的盛衰兴亡和地理大势；次为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一百一十四卷，分叙名山、大川、重险，所属府、州、县及境内部分都司卫所的疆域、沿革、古迹、山川、关津、镇堡等，并记载其地发生的历史事件，考订其变迁，剖析其战守利害；再为川流异同六卷，专叙禹贡山川的经流源委及漕河、海道；末为分野一卷。另附《輿图要览》四卷，内容有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九边、黄河、海运、漕运及朝鲜、安南、海夷、沙漠等图。是书可谓明代以前历史地理学之集大成者，其中关于沿海各省的论述，多涉及明代以来的海防地理形势和分防备倭情况。该书当时即被誉为“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sup>27</sup>，颇受当代及后人推重。

康熙中期，吏部侍郎杜臻撰《海防述略》一卷。施琅平定台湾后，清政府决定各省开海展界，并派大臣分赴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巡视沿海防务，主持开海事宜，吏部侍郎杜臻奉命与内阁学士石柱一道巡视闽粤两省。这次巡视之后，杜臻结合其他几位大臣在浙江、江南巡视情况，撰成《海防述略》一书<sup>28</sup>。是书略述广东、福建、浙江、江南、江北、登莱各地海防地理形势、设官驻军方案，可谓清初海防思想和实践的集中反映。道光八年（1828年）曹溶《学海类编》、光绪三年（1877年）王锡祺《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是书均被收录，可见其在清代海防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据当代学者研究，该书显然继承了明代周弘祖《海防总论》和郑若曾《郑开阳杂著》中的许多观点<sup>29</sup>。这里尚需注意的是，明代周弘祖的《海防总论》，其实又明显继承了郑若曾的著作。《海防总论》开头略述全国海岸势要之后，紧接着是一段关于倭寇的论述：“总其入寇，则随风所之。东北风猛，则由萨摩，或由五岛，至大小琉球，而视风之变，北多则犯广东，东多则犯福建。正东风猛，则必由五岛，历天堂官渡水，而视风之变，东北多则至乌沙门分鲸，或过韭山海闸门，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

<sup>25</sup> 《天下郡国利病书》，《续修四库全书》（595）·史部·地理类，第640页。

<sup>26</sup> 《天下郡国利病书》，《续修四库全书》（597）·史部·地理类，第6-7页。

<sup>27</sup> 《读史方輿纪要》，魏禧叙，《续修四库全书》（598）·史部·地理类，第3-4页。

<sup>28</sup> 《海防述略》，提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7册》，第267页。

<sup>29</sup> 比如《海防述略》中的“沿海全境”一节基本与《海防总论》相关部分雷同，“广东”一节与《郑开阳杂著》卷一的“广东要害论”很相似，“登莱”一节则脱胎于《郑开阳杂著》卷二“登州营守御论”。参见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

犯象山、奉化、犯昌国、犯台州；正东风多，则至李西岙壁下陈钱分舟宗，或由洋山之南而犯临观、犯钱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仓，或过南沙而入大江，犯瓜仪常镇，或在大洋而风吹东南也，则犯淮扬、登莱。若在五岛开洋而南风方猛，则趋辽阳、天津。防倭者以三四月为大汛，九十月为小汛。向之入寇者，萨摩、肥后、长门三洲之贼居多，其次则大隅、筑前、筑后、博多，博人善造舟，而丰前、丰后、和泉之人，间亦有之，乃因商于萨摩而附行者。”<sup>30</sup>这段话显系摘自《筹海图编》卷二“倭国事略”，几乎一字不差。《海防总论》云“广东列郡者十，分为三路。西路高雷廉近占城、满刺诸番，烟烽希圻。中路东莞，东路惠潮，皆倭寇不时出没之地，而东路尤为要冲。若柘林者，又必东路控贼之咽喉门户也。无柘林是无水寨矣，无水寨是无东路矣。”<sup>31</sup>此段则改编自《郑开阳杂著》卷一“广东要害论”。也就是说，作为清初海防重要文献的杜臻《海防述略》，其实源于郑若曾的海防论著，其要义和基本内容，都体现了明中期以来“备倭”话语的延续。

康熙中期，名儒姜宸英亦撰《海防总论》一卷。是编本古为今鉴的初衷，首先回顾明初海防建设及废弛情况、嘉靖倭患的经过，然后引用《筹海图编》卷12“御海洋”篇内的论述：“善乎总制胡宗宪之言曰：夫谓之海防者，则必宜防之于海，犹江防者必防之于江……故议欲分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苏松之船以守马迹，定海之船以守大衢，则三山鼎峙，哨守相联，可扼来寇。而又其外陈钱诸岛久为贼冲，三路之要，宜以总兵屯泊其地，每于风汛时协军巡哨，使不得越岛深入，则内地可以安堵。总兵俞大猷亦曰：倭自彼岛入寇……”对于郑若曾“必哨贼于远洋而不常厥居，挈贼于内洋而不使近岸”的观点，姜宸英谓“斯策之最善，而当时之议，亦卒未有能易此者也。”<sup>32</sup>然后详述明自洪武以来设官立军以防海外、海港、海岸事宜，各省会哨海界，及日本朝贡入寇互市始末，然后各列今制，依海道所经，自广东西路、福建、浙江、江南、登莱、天津卫、辽阳以次及之，又括海南、北所经各省郡县自为一卷，其沿海山沙、寇船入犯分合、日本舆地皆有图（今本图缺）。从内容上看，是书基本为郑若曾著作的延续，只是补充了一些当代的资料而已。杜臻的《海防述略》虽然同样沿袭了《筹海图编》的基本内容，但毕竟有自己的实地考察所得，因而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相比之下，姜宸英的《海防总论》更具守成色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部守成之作，先是随姜氏《湛园集》一并收入《四库全书》，后又收入曹溶的《学海类编》、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在清代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此种际遇，颇能显示清代海防思想发展在时间意义上的“眼光向后”特征，即注重历史经验教训的传承，守成有余而创新不足。

清初韩奕撰《海防集要》一卷，列举沿海各要冲之处及明清以来的设官驻军方案。与明中期以来的海防论著一样，是编仍然以“倭寇”为假想敌，内容上多沿袭郑若曾的著作。比如论江南海防要点：“倭寇过洋，如遇南风多则犯浙直，遇北风多则犯闽广，中流风水不便则收马迹洋山，候便开船。如遇南风，必由高家嘴而入犯七、八、九团，以至竹箔沙、宝山、吴淞入内。彼处设镇守。且刘河与吴淞海面不远，兵船瞬息可至。见分五哨，一哨泊守新灶，一哨泊守黄寨，一哨出洋远探，二哨坐泊港内……”<sup>33</sup>论浙江海防形势一段，显系辑自《郑开阳杂著》卷一之“浙洋守御论”：“浙海诸山，其界有三黄、牛山、马墓、长涂、册子、金

<sup>30</sup> 《天下郡国利病书》，《续修四库全书（597）·史部·地理类》，第244页。

<sup>31</sup> 《天下郡国利病书》，《续修四库全书（597）·史部·地理类》，第244页。

<sup>32</sup> 《湛园集》，卷4，“海防总论”，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33</sup> 《海防集要》，《丛书集成新编第97册·史地类》，第93页。



塘、大榭、兰秀、剑山、双屿、双塘、六横、韭山、檀头等山，界之上也；滩山、许山、羊山、马迹、雨头、洞渔山、三姑、霍山、徐公、黄泽、大小衢、大佛头等山，界之中也；花脑、求芝、络华、弹丸、东庠、陈钱、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必由之道也。海防莫急于舟师四参六总分哨守各洋港……今日之设险，自内达外有三重焉……备至密也。”<sup>34</sup> 论述广东海防形势的一段，完全取自《筹海图编》卷三之“广东事宜”：“广东海防分为三路。东路为惠潮二郡，与福建接壤，漳舶通番之所必……中路广州置省，环海大洋，风涛千里，皆盗贼渊藪，尝考之三四月东南风汛，日本诸岛入寇，多自闽趋广，柘林为东路第一关锁，使先会兵守此，则可以遏其冲而不得泊矣……西路高雷廉三郡逼近占城、暹罗、满刺诸番……”<sup>35</sup> 仅个别文字有所损益。

乾隆嘉庆年间，东南沿海一直没有平静。来自日本的威胁虽然降低，台湾也已纳入统一的版图，但大规模的海盗集团复又蜂起<sup>36</sup>；同时，明中期以来一直在中国沿海活动的西洋“夷”，也越来越不听约束，不断尝试扩展其势力。至道光年间，这种来自海上的压力愈形强烈。在此形势下，又一批海防论著纷纷面世。比如嘉庆六年（1801年）刊印的薛传源《防海备览》十卷，道光十八年（1838年）刊印的严如煜《洋防辑要》二十四卷，以及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刊印的俞昌会《防海辑要》十八卷。这些著作的性质与明中期郑若曾的《筹海图编》类似，均属于具有官方背景的综合性地防资料汇编，并且其中许多内容与郑氏著作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面世于鸦片战争前夕、规模最大的《洋防辑要》，既可谓这一时期同类作品的代表，也可以说是明嘉靖年间郑若曾以降海防撰著的涓涓细流的汇集和尾声。

《洋防辑要》的编纂者严如煜（1759—1829），湖南溆浦人，嘉道年间知名的经世学者，曾经在两江总督那彦成手下参与筹划海防事宜，因有《洋防辑要》之纂。该书凡24卷。卷一为“总分直省海疆图说”，共包括12幅舆图：直省海洋总图，盛京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洋图，高丽舆地图、安南舆地图、东南洋外夷图、西南洋外夷图，元明海运卫所图。卷二、卷三为“国朝洋防经制”，辑录清代以来关于水师管理、出海民船管理方面的文件，以及各省水师分防编制、水师人事管理、沿海府州县概况资料等。卷四至卷八，分别为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舆地考”，其资料完全辑自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卷九至卷十五，分别为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防海略”，其资料完全辑自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六为“沿海形势总略”（杂辑），卷十七为“策略”（杂辑），卷十八为“风潮占验”（杂辑），卷十九为“操练水师略”（辑自戚继光《纪效新书》），卷二十为“水战筹”（辑自《金汤备箸》），卷二十一为“兵器筹”（杂辑），卷二十二为“海运旧制”（杂辑），卷二十三为“盐务”（辑自《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四为“洋夷市贡”（辑自《天下郡国利病书》）。

值得注意的是，像《洋防辑要》这样一部面世于鸦片战争前夕的海防巨著，像严如煜这样一位亲身经历过广东海事的士大夫，其海防思考方向依然是“眼光向后”。他在该书序言中阐述了明代倭患历史及海防经验教训的重要意义：“夫不知前代之失，无由知国家之所以为得也。明自嘉靖以降，陵夷不可言矣。当信国公沿海设立卫所之初，弃昌国浯屿澎湖南澳各要不守，论者已有撤我藩篱、貽寇巢窟之憾。迨后纪纲日弛，卫所虚存，内地奸民勾结倭

<sup>34</sup> 《防海集要》，《丛书集成新编第97册·史地类》，第94页。

<sup>35</sup> 《防海集要》，《丛书集成新编第97册·史地类》，第95页。

<sup>36</sup> 参见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刘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夷，乘间发难，东南滨海数千里生灵涂炭，一时名臣宿将群策群力，经营十数年，会倭饱思归，直海受饵，吴越烽烟浸熄。而闽广洋患旋扑旋生，蔓延不已。失要则乱，诘不信欤！”然后略述明嘉靖年间郑若曾等人的海防论述，及清初顾祖禹、顾炎武等人的地理著作，表示自己此书系辑录他们的观点资料，期望“沿海文武士民，恪循经制，无敢废坠，则亿万斯年享义安之福也已”<sup>37</sup>。也就是说，他希冀将明中期以来二百余年的海防经验教训集为大成，以为后人一劳永逸之计。

从思想内容来看，严如煜这本书同样没有超出明中期以来“备倭”话语的框架。书中关于江南和广东两地海防的论述即可证明这一点。卷九“江南防海略”首先描绘海防对象：“倭奴撮尔之丑，数踟躇于波涛间，东南并海州县时被其毒……倭奴天性狡猾，以剽劫为俗，而溟海万里，因风力，乘潮候，倏忽不可踪迹，所谓来如风雨，去如绝弦，犹不足以喻之，故武备既设，时复跳梁”<sup>38</sup>。然后论述江南在海防战略中的重要性：“国家重根本之地……夫浙中之定海、浙西之乍浦、直隶之吴淞，若人家有东西户耳，一方失守，其祸共之。议者莫不言御倭于海，谓之上策。竹箔沙者，吴淞之屏蔽也，其外为羊山、为陈钱，皆倭奴之所从入……”<sup>39</sup>。关于江南各府江海防卫形势的记载，亦时而夹杂明中期的“倭寇”记忆。如“宝山在[嘉定]县东南八十里……为滨海戍守之所，嘉靖中倭寇入犯，每以宝山为望，故邑之被害罪剧，而宝山常为贼藪”；“明嘉靖中倭寇出没，[太仓]州每当其冲，就东南言之，州亦襟要之所矣”；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与黄浦东之三林塘、周浦镇相望，倭贼由三林周浦渡黄浦而西即犯县治，若犯府境，必由乌泥泾而西为控扼之要地”；“掘港营在如皋城界一百三十里，距海大洋三十里，东南西三面环海，西一路接如皋，尤倭寇首犯要地……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大举入寇，大被蹂躏”。<sup>40</sup>关于江南海防的总体方略：“海防之策有二：曰御海洋，曰固海岸。何谓御海洋？会哨陈钱，分哨马磧、大衢、羊山，遏贼要冲是也。何谓固海岸？修复备倭旧制，循塘拒守，不容登泊是也。总督胡宗宪云：海防之制，谓之海防必宜防之于海，断乎以御寇羊山为上策。其言是也。盖苏松事体与浙福不同。夫倭船之来，必由下八山分艘。若东南风猛，则向马磧西南行，过韭山以犯闽粤；若正东风猛，则向大衢西行，过乌沙门以犯浙江；若东北风猛，犯向殿前羊山，过淡水门以犯苏松……郑若曾云：哨贼于远洋而不常厥居，挈贼于近洋而勿使近岸，两言颇为知要。”<sup>41</sup>并针对苏州、松江二府海塘、海港之有无提出了不同的海防要略。而这些“备倭”论述，均辑自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而顾炎武这些话，又辑自郑若曾的《江南经略》卷一下之“海防论一”、“海防论二”，以及《筹海图编》卷十二之“御海洋”等篇。

如果说江南因为地近日本，且嘉靖倭患尤重，海防思路自然以“倭寇”为警，以“备倭”为要，那么关于倭患相对较轻的广东地区，海防思路是否有所不同？实际不然。关于广东海疆，该书首先提到的就是明代倭患：“海环广东南界，倚为险固，然攻守之计亦莫切于海……洪武永乐间倭夷入犯，广东屡为所扰。嘉靖中倭寇闽浙，滋蔓亦及于广东。”<sup>42</sup>关于广东海防形势，该书依然沿袭郑若曾以来的三路说：“议者谓广东海防当分为三路。三路者，左为惠潮，右为高雷廉，而广州为中。惠潮二郡皆与福建接壤，而潮尤当其冲。柘林、南澳

<sup>37</sup> 《洋防辑要》，序，道光戊戌来鹿堂版。

<sup>38</sup> 《洋防辑要》，卷9，页19。

<sup>39</sup> 《洋防辑要》，卷9，页19-20。

<sup>40</sup> 《洋防辑要》，卷9，页4-5、8、25、33。

<sup>41</sup> 《洋防辑要》，卷9，页2、4。

<sup>42</sup> 《洋防辑要》，卷8，页1。

皆要区也……若夫中路之备，则在屯门、鸡栖、佛堂门、冷水角、老万山、虎头门等澳……若西路三郡去倭岛似远，而安南、占城、暹罗、满喇诸番风帆易达……而琼州又廉州之外户也，五指腹心尽为黎据，所设城邑类皆滨海，备倭之制，若白沙、石衢、埕头、文昌与海安、海康，对峙番岛，飘风突来，防御甚艰。此西路所当加意者也。”<sup>43</sup>海防要点如下：“海口有三路，设巡海备倭官军以守之，春末夏初风汛之时，督发兵船出海防御。中路自东莞县南头城出佛堂门、什字门、冷水角诸海澳……东路惠潮一带自柘林澳出海，则东至倭奴国，故尤为滨海要害……无柘林则无水寨矣，东路官军宜于九月无事日掣班之时，定以柘林为堡，阻其咽喉之路。且附近大城所官军互相哨守，庶保无虞……西路高雷廉海面，惟廉州接近安南、占城，为重地焉。”<sup>44</sup>这些论述分别辑自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和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而两顾显又辑自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三之“广东事宜”和《郑开阳杂著》卷一之“广东要害论”，其海防思路依然不脱明中期以来的“备倭”框架。

当然，《洋防辑要》也体现了些许新意。一方面，该书对华南沿海“盗贼”更加重视：“又滨海诸邑为盗贼渊藪者，如增城、东莞之茶寮、十字寮，番禺之三曹、波罗海，南海之仰船冈、茅寮，顺德之黄头涌，香山新会之白水、分水等处，往往岁集凶徒，以小艇出没，珠禁弛则纠党盗珠，珠禁严则诱倭行劫，此又当诘奸禁宄以消其萌矣”<sup>45</sup>。郑若曾在《筹海图编》卷三专设“广东倭变记”，以编年方式集中记述明初以来广东历年倭患。《洋防辑要》亦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辑录了类似的编年记载，不过内容更加详细，且添加了更多的“海寇/贼”事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嘉靖“倭患”一个多世纪以后的顾炎武，还是近三个世纪以后的严如煜，均与作为“倭患”亲历者的郑若曾一样，都是在“倭患”的框架下，来将这些频年发生的“海寇/贼”事件编入史册的，尽管“海寇/贼”与“倭寇”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明中期以来的“备倭”话语对后人海防认知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时间过去了两个多世纪，严如煜那一代人的海防知识，自然比明中期的郑若曾一代更加丰富。对此，严如煜似乎颇感自豪：“二百年来，外夷、东南洋并大小西洋，往史所未载者，重译而来，献球通市，争效惓忱。而内地人民出洋回换，亦视暹罗、葛喇、配石、赤仔、六坤、吕宋、安南之属不啻户庭，估师长年衽席沧溟康庄岙屿。凡内海海洋沙线礁碛趋避驾泊之宜，罔不了如指掌。在昔元人运道、明代卫所，元老宿将经营数十年始得要领，今则海滨士民均能凿凿言之。以言市舶则无路不通，以言防倭则无要不备。”<sup>46</sup>但问题在于，明中期至清中期的近三百年里，中国人的海防论说，所走的一直是渐进式演进道路，具体知识确实有很大的丰富，尤其是关于本国沿海地带和亚太地区海域的地理知识；而海防论说的“御倭”目标和“备倭”框架，却基本没有改变。

### 三、“倭寇”记忆、“备倭”话语对中国海权观念演进的影响

如前所述，明清时期的海防著作保存着一种持之以恒的“倭寇”记忆，形成了一种从“倭患”历史中寻求“御倭”方略的“备倭”话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海防论著的编纂和刊印，并非出自赢利性的书商背景，而是出于官方背景。其编纂者多为有过海事经历的士大夫；编纂工作的缘起往往与海疆危机或海事经历有关；编纂过程中往往得到官方，尤其是沿

<sup>43</sup> 《洋防辑要》，卷8，页1。

<sup>44</sup> 《洋防辑要》，卷14，页4。

<sup>45</sup> 《洋防辑要》，卷8，页2。

<sup>46</sup> 《洋防辑要》，卷1，页15。

海督抚及各级防务机构的积极支持与配合；著作编成后，主要在士大夫尤其是与海防有关者当中流传。这表明，上述著作中体现的“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基本可以说是时人思想和观念的真实反映，也确实对时人及后代的海防思想、海权观念产生了真实的影响。

那么，这种“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为何能在明清时期的海防论中长期延续？其中原因，初步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首先，有明一代，日本确实对帝制中国形成了一定的海上威胁。帝制中国时代，于中外关系首严华夷秩序，海防论说亦奉此为最高准则。郑若曾在“刻筹海图编引”中，一开头即称“于戏天地剖判，厥有华夷，华内而夷外，华驯而夷犷，华冠裳而夷鳞介，斯阴阳之大分也。山海之险，天固为之防乎！”<sup>47</sup>但明朝成立之初，日本就游离于这一秩序之外，此后数百年，先有小股日本海盗入寇中国沿海，复有所谓嘉靖倭患，万历年间再有日本进犯朝鲜事件。凡此种种，均予士大夫深刻印象，使他们对日本保持警惕；明中后期一系列海防论著的编纂，也往往是在倭患事件的刺激下而提上日程。其次，在当时的中国，海防论是一个相对偏僻的知识领域，同时有着很强的实践性。其形成、发展通常有赖于前人实践经验的积累，一旦形成某种既定论说框架，后人往往沿袭之，很难独辟蹊径，另成一家或数家之言。郑若曾的开创性著作一出，后来者遂多承续其思考方向、论说框架，乃至具体内容。再次，中国士大夫素来重视历史记忆的保存，习惯于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寻求对现实的借鉴。在这方面，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尤为突出，他的著作和言论中表达了一种关于文化和历史的忧患意识。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亦体现了这种思维倾向，有意从明中期以来的海防论著、地方志中辑录了关于倭寇历史和御倭方略的资料，以为后人借鉴。这种自觉的忧患意识果然产生了实际效果，如当代研究者指出的，明代周弘祖《海防总论》一文，在其它文献中已很难找到，正是由于《天下郡国利病书》的收录，才得以保留下来并对清初海防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sup>48</sup>。

从长时段来看，这种持之以恒的“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固然促进了中国海防思想的渐进发展，但同时也制约了明清时期中国海权观念的进步。这种制约体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倭/寇”不分的“备倭”话语之下，海防的对象其实主要指向了中国的民间海洋力量。所谓的“倭寇”，明代的官私著述即已注意到多为中国人。如《嘉靖实录》云：“是时海洋并岸诸岛，多栖寇舟……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sup>49</sup>。郑若曾的《筹海图编》说：“壬子岁，倭寇初犯漳泉，仅二百人，其间真倭甚寡，皆闽浙通番之徒，髡辮以从”<sup>50</sup>。明人郑晓在《吾学编》中也说：“自壬子倭奴入黄岩，迄今十年，闽浙、江南北、广东，人皆从倭奴，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sup>51</sup>。从《洋防辑要》卷十五的记述来看，自洪武初年至嘉靖末年，广东各地的海患，多数实由“海寇/贼”，也即民间海上力量而起，所谓“倭寇”仅为寥寥数例。可能正因为此，一些著述中也使用“海贼”、“海寇”来指称这一涉海社群。学术界现已基本明确，明代的倭寇、海寇，就其性质而言实为民间海洋力量，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涉海社群，只不过在政府的海禁政策下，其行为倾向呈现为与国家政权背道而驰<sup>52</sup>。但是，明清时期的各种海防论著，却依然大量使用“倭寇”

<sup>47</sup> 《筹海重编》，卷之首，“刻筹海图编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7册》，第6页。

<sup>48</sup> 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第181页。

<sup>49</sup> 《明世宗嘉靖实录》，卷403，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壬寅条。

<sup>50</sup> 《筹海图编》，卷3，“广东倭变纪”，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51</sup>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

<sup>52</sup> 参见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戴裔焯：《明代嘉

名义来指称他们，“倭”、“寇”、“盗”、“贼”，“御倭”、“御寇”、“御盗”、“御贼”等词汇往往不加区分地混同使用。而且越到后来，越强调对海上“寇/贼”的防备。《清史稿》称“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sup>53</sup>，可谓一语中的。这样，“备倭”即为“御寇”，江海防卫的基本目标所指均为中国的民间海洋力量，而非来自海洋竞争中的他国势力。明中后期如此，至清中期依然如此。

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近代海权论鼻祖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论述了海权成长的六个条件，即地理位置、陆地形状、领土范围、人口、民族性格和政府政策。其中，民间海洋力量之于一国海权兴衰具有重大意义：“濒海国家的历史与其说是由其政府的高明与远见，还不如说由其民众的地位、范围、组合、数量及性质来决定的”；“从事与海洋有关职业的庞大人群，一如既往的是海上权利的重要因素”；“对于广义的海洋霸权的成长产生过巨大的确定性影响，其中不仅包括海洋上的军事实力，也涉及和平贸易与航运”。<sup>54</sup>马汉并且指出，没有强大的民间海洋力量为基础，“一位独裁君主可以组建起一支纯粹军事性质的海上力量，正如同路易十四的所作所为那样。然而，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样一支海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但经验显示，他的海军就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就会枯萎。”<sup>55</sup>不过，在明清时期“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下，官方的海洋经略中基本没有为民间海洋力量留出一席之地。这对中国海权观念演进，对中国海权成长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方面，在“备倭”话语下，“倭/寇”成为海防的基本对象，而16世纪以来开始对中国海权形成真正威胁的欧洲商业殖民主义力量，却被相对忽略。当然，对于西方殖民势力在东方的扩张苗头，清前期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有所觉察。但他们的观察和思考依然在“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的框架下展开，往往将西方国家的海上扩张活动与倭寇相提并论。比如蓝鼎元在其著名的《论南洋事宜书》中说：“统计天下海岛诸番，惟红毛、西洋、日本三者可虑耳。口葛吧本巫来由地方，缘与红毛交易，遂被侵占，为红毛市舶之所。吕宋亦巫来由分族，缘习天主教，亦被西洋占夺，为西洋市舶之所。日本明时作乱，闽江浙皆遭蹂躏，至今数省人民言倭寇者，尚心痛首疾。”<sup>56</sup>屈大均的观察视角与此类似：“吾粤三面阻海，而南澳为左蔽，濠州为右翼，虎门为前兵，此皆险要。倭与红毛若乘汛举连天之舶而前，则南澳必先受敌，虎门犄角二隅，未多置兵，则内户不键也。诸舶往来飘忽，而山寇阴行勾引，其为祸可胜道哉！”<sup>57</sup>严如煜的《洋防辑要》亦与此类似，该书与此前的海防图相比，卷一多了两幅“东南洋外夷图”和“西南洋外夷图”，但如前所述，该书主体内容仍以“御倭”为目标导向，依然在延续着明中期以来的“备倭”话语。无独有偶，成书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另一部海防论著——《广东海防汇览》，同样如此。该书主要编纂者为广东著名经世学者梁廷楠，汇集正史、方志、文集、案牍公文、档册、营册等资料，备载广东海防资料，包括沿海要冲、分防布置、操练巡哨、营制、赏罚、炮台、器械装备、风潮、战例等，

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陈尚胜：《“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sup>53</sup> 《清史稿》，卷138，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538页。

<sup>54</sup> 马汉：《海权论》，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28、50页。

<sup>55</sup> 马汉：《海权论》，第90—91页。

<sup>56</sup> 蓝鼎元：《鹿洲初集》卷3，“论南洋事宜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57</sup>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8，“舟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寻根溯源，明其源流嬗变，有研究者誉之为一部“广东海防通史”<sup>58</sup>。不过，关于欧洲东来势力对广东海防的冲击，书中却未显示特别的关注。

当代研究者指出，清前期的多数海防地理论者“对于来自西方的威胁认识还相当模糊，有的感觉甚至是错误的”，因而“一直把日本作为海上的主要对手，长期把小股的倭寇作为海防的假设敌”<sup>59</sup>。导致这种局面，对西方威胁的认识模糊固然是个原因，但“倭寇”记忆和“备倭”话语的长期延续以至于形成思维定势，才是更深层的原因之一。

## 结论

综上所述，明中期以后以迄清中期的海防论述，均打上了深刻的“倭寇”记忆，这对明清时期的海权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时期的一系列海防论著，多以“倭/寇”为假想敌，以“备倭/防寇”为基本着眼点，从明嘉靖年间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到鸦片战争前夕严如煜的《洋防辑要》，莫不如此。这些海防论著表达了一种“眼光向后”（backward-looking）的海权观念。从时间意义上看，这种海权观念多以数百年前的历史经验为准绳，而不是密切关注变化中的现实形势；从空间意义上看，这种海权观念多以陆权为中心，目标不在于如何经略海洋，而在于如何防范东亚“华夷”秩序圈内的传统挑战者——“倭/寇”，尤其是防止中国民间海洋力量对帝制政权的挑战，却忽略了正在膨胀的另一种新兴挑战者——欧洲商业殖民主义。对手意识的错位，阻碍了中国海权观念的进步，埋下了中国在中西海权竞争中失败的深刻缘由。

---

<sup>58</sup> 陈文源：《〈广东海防汇览〉研究》，载李金强、刘义章、麦劲生编：《近代中国海防—军事与经济》，香港：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1999年，第41-60页。

<sup>59</sup> 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第252、267页。